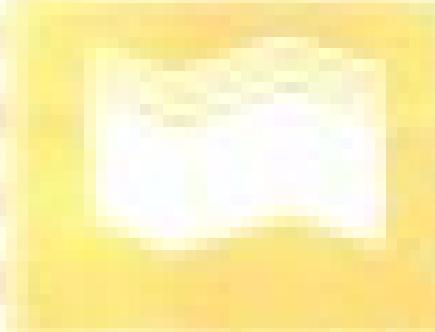




# 台湾作家创作谈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台灣作家創作選

編輯：黃曉君

設計：黃曉君

# 台湾作家创作谈

庄明萱 阙丰龄 黄重添 选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 台湾作家创作谈

庄明萱 阙丰龄 黄重添 选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7.625印张 180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80

书号：10368·2 定价：  
1.50元

# 目 录

坎坷与灿烂的回顾	杨 達( 1 )
《亚细亚的孤儿》自序（日文版）（节录）	吴浊流( 7 )
谈描写方法	吴浊流( 10 )
个人的生活道路与文学创作	钟理和( 17 )
长篇小说《笠山农场》的收场	钟理和( 22 )
《台湾人三部曲·后记》	钟肇政( 24 )
诚实与含蓄的故事	洪醒夫( 27 )
—— 郑清文访问记（节录）	
试论陈映真	许南村( 37 )
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	黄春明( 47 )
那一牛车的嫁妆拉到哪里去了	秋 董( 63 )
—— 访王祯和	
访问王拓（节录）	钟言新( 73 )
喜悦的悲悯	李 昂( 80 )
—— 杨青矗访问记（节录）	
文学的旗子	梁景峰( 92 )
—— 与杨青矗畅谈	
季季谈创作经程（节录）	季 季( 97 )
季季的创作生活	许德贤( 111 )
我与文学	宋泽莱( 115 )

我的写作过程	曹心仪(118)
浪子的悲歌	聂华苓(121)
苓子是我吗?	聂华苓(127)
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	於梨华(131)
蓦然回首	白先勇(149)
关于我自己	欧阳子(159)
——回答夏祖丽女士的访问	.
命运的迹线	夏祖丽(189)
——王文兴访问记	
我的文学生涯	尉天骢(200)

# 坎坷与灿烂的回顾

杨 迹

1920年，留学东京的台湾青年成立“台湾青年会”，发行《台湾青年》杂志，它曾数度易名，依序为《台湾》、《民报》、《台湾民报》等。刊物的发行正巧在五四运动后一年，因此受到五四很深的影响。早期留学生均有中文基础，所以《台湾青年》成为汉文杂志。文章形式则白话文、文言文皆有，后来陈端明、黄朝琴等人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主张采用白话文，于是白话文遂逐渐占了优势。杂志的内容以一般启发性的文章为主，且兼谈政治问题；同时，它也介绍胡适之先生的作品。

1921年，日本政府制定“六三法令”。此法令明定台湾总督有制定法律之权。1923年，林献堂等人到东京“帝国会议”请愿，请求设立“台湾议会”，以对抗“六三法令”。但请愿未能成功。同年，蒋渭水所组织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在台北活动，受到日本警察的干涉。

1924年，年方十八尚在中学念书的我，启程前往东京。我之所以离乡去国的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找寻思想上的出路。记得在我十岁时，“噍吧哖抗日事件”发生在我老家新化附

近。那时候日军时常前来骚扰，我心中十分惧怕。其后，我大哥被日本人捉去当军伎，他常告诉我一些目睹亲闻的惨事。到我稍长，我曾读到一本书——《台湾匪志》。此书记载台湾十数次的抗日活动。文中称抗日义士为“土匪”，抗日活动为“匪乱”。及此，我猛然领悟统治者已公然伪造历史，扭曲事实。我认为台湾人有重写历史的责任。因此，我决心走上历史与文学之路。另外，学校授受的又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故萌前往日本的意念。

另一个离台的原因，则是为了躲避强迫的婚姻。我幼时体弱多病，别人戏称我为“鸦片鬼”。台湾民间迷信有此一说，若将小女孩的衣服穿在身上，上庙祈拜，可较容易维持身体的健康。在我十二岁那年，我父亲朋友的女儿将衣服让给我，不久，她就进了我家当童养媳，我生性不喜受人强迫，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婚约我实在无法忍受。再加上，这件事使我成为同学的笑柄。所以她虽然在我家住了好几年，但我却从未与她交谈过。

到了日本之后，我通过检定考试而进入了日本大学文学艺术科夜间部。因为家中贫困，不能经常寄钱来，所以我四处做零工以维持生活。同时也因为这种关系，使我经常与社会保持相当的联系，不致成为读死书的蛀书虫。这时候，我的写作方向逐渐形成。我理想中的作品是反抗贵族奴役，宣传民族主义的文章。而且我也注意到中国时局的发展，对孙中山先生及三民主义的理想十分佩服。

我在日本组织了“文化研究会”，参与“劳动运动”与“政治运动”，特别是“演剧研究会”更是我的兴趣所在。每年暑假，留日的台湾学生组团回台各地，在庙寺等开会演讲，讨论政治、思想的问题，日本警察经常到会场监视，如果有言辞过分激烈的情况，警察往往出面阻止，解散会众。由于学生内心不平，于是经常举行示威游行，到警察局抗议、扔石头。

1927年，我在日本参加朝鲜人的活动，第一次被捕。数日之后即被释放。

1927年，我应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农民组合的召唤回国，参加台北的民众演讲会。随后，我奔波于台湾各地。组织农民，目的在替他们解决问题。我曾因领导农民游行，先后于竹山、小梅、朴子、麻豆、彰化、中坜等地被捕。这段时期，我忙于农民运动，虽然很想写作，但没有时间。日本人追捕我，是因为怕我领导民众游行，所以每次拘留的时间都很短。最长的一次是十七天，发生在叶陶女士与我举行婚礼的黎明前。

这件事发生于1929年2月12日。叶陶与我应邀参加台南总工会大会演讲后，在台南文化协会支部休息，等天亮要回家乡新化举行婚礼，就在这时候我俩双双被捕，我被扣上脚镣手铐，先送进台南监狱，然后转送台中监狱。这次入狱者共有四百多人，大部分有名的抗日分子都被捕了。其后，日本人侦察愈烈，抗日活动无法展开，抗日团体多被封闭了。

婚后，我靠做些小生意为生，同时也到砖窑做过工，上山砍柴等。由于生活穷困，不能到处奔波，于是便在高雄寿山麓定居，再次拿起笔来，用自己的观点写历史性、文学性的文章。

1932年夏天，我完成了第一篇小说《送报夫》，经由赖和先生的介绍，发表于《台湾新民报》。但是它只刊了一半，后半截被禁刊了。

隔年，东京的《文学评论》进行征稿，《送报夫》得了第二奖（第一奖缺）。这时候我已经来台中从事《台湾文艺》日文版的编辑工作，叶陶与小孩住在彰化，住在赖和替我们租的房子，同时，叶陶靠着缝制童装维生。有一次当我把登《送报夫》的《文学评论》拿给赖和看时，他非常高兴，他双手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能说话。每思及此，我便由衷地感激赖和先生，他是我文

学创作的导师，在我贫困潦倒时，他经常鼓励我、关照我。

1934年，我担任《台湾文艺》的编辑委员。《台湾文艺》继承《台湾青年》的精神，坚持反抗暴力统治。当时，我才刚出道，对出版界事事陌生。稿件都是由张星健先生选好，再交给我整理。由于他和我选稿的作风、方针大异其趣，许多我认为好的文章他都不中意，而我要求召开编委会议以决定分别负责，却又未能解决，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受到投稿者的抗议后才停止。

1935年底我退出《台湾文艺》，自创“台湾新文学社”。我创办《台湾新文学》月刊，并不是为了对抗《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与《台湾文艺》目标相同，但《台湾新文学》在选稿上较为客观，中文由赖和、杨守愚，日本诗由“盐分地带”（台湾佳里）的吴新荣、郭水潭等负责，所以在一年内刊出不少新作家的新作品。当时真是创业维艰！

叶陶于雾峰吴厝庄当家教，集了二十几个学生，以微薄薪资，每人大约一元，资助我的事业。叶陶生性豪放坚强，我的父亲称她为“女流氓”，但她不愧是我的贤内助。

1937年，《台湾新文学》杂志被迫停刊，因此我再度前往日本。

在台湾，我的作品多被禁刊，因涉及日本本土的出版检查尺度较宽，所以想将这些文章带到日本整理发行。这年，“七七事变”发生，我在日本曾受到警察的跟踪而隐居。9月，我返台，因劳累过度而身染肺病，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对我极尽照顾，他开辟了“首阳农园”让我种花，我资金无着落，他也资助我，但他却被日本当局视为思想有问题，而决定将他驱逐出境，经过慷慨的争辩之后，他竟然因而自杀身亡。知己零落如此，诚令人感慨！接着，我的母亲、父亲相继而逝。回想这三年，那真是艰苦的日子！

太平洋战争以后，日军处处碰壁，于是他们想出“东亚共荣圈”“打倒英美帝国主义”等名词，以欺骗群众，想动员作家们替他们做宣传，组织“皇民奉公会”、“艺能奉公队”等，从事文化艺术工作。

1944年，我们几个朋友利用“台中艺能奉公会”演出《怒吼吧，中国》一剧。这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日本节节败退。而此剧的演出由于极富民族精神，故演出效果十分良好，观众情绪极为热烈。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将辛苦经营的“首阳农园”改称为“一阳农园”，并发行《一阳周报》，以庆祝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

1948年，我再发行《台湾文学丛刊》与《中国文艺丛书》（中日文对照）以应受日文教育的多数台湾人民学习语文之要求，刊出的文章以反应现实的社会为目标。我认为文章应该排除虚幻、颓废，而是启发面对现实，作生活感情与思想动向的具体描述。无病呻吟，空思梦想和歌功颂德拍马屁的文字都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早期曾以日文著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想用自己国家的文字写作，但我自幼便一直接受日文教育，根本没有中文的基础。有一段时期，为要让台湾同胞看懂我的文章，我曾经尝试用台湾语写作，结果，弄得自己现在都看不太懂。不过，我还是赞同有乡土味道的作品。几年前，台大外文系的学生办了《现代文学》。这个杂志的缺点是传播一些不合社会环境，难以吸收消化的西洋文化。我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能懂，文学的开始须是在他自己身边一事一物。我们追寻的是可以感觉、接触得到的现实，而不是空泛的玄思。目前《中国时报》的报导文学很重视乡土，我以为是较健康、写实的路。

这次《联合报副刊》召开了“光复前台湾文学座谈会”，介

绍那一段时期的作家与作品，继而推出那段时期的作品论、作家论、社团论等，都在表现文学艺术要寻觅我们的根，要在乡土上扎根的表现。我很高兴看到一直被埋没在深洞里的我们奋发图强写出来的作品，再度出现在阳光下，也让失落了多年的年轻一代找到了根，把历史的断层弥补上来。

（选自陈连顺、丘为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回顾》）

# 《亚细亚的孤儿》自序

(日文版) (节录)

吴 浊 流

世界如今又变成灰色了。如果探索它的底流，不一定没有隐藏着可怕的事情吧！

历史常是反复的，历史反复之前，我们要究明正确的史实，来讲究逃避由被弄歪曲的历史所造成的运命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征诸过去的史实来寻求教训。

《亚细亚的孤儿》这篇小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1943年起稿，1945年脱稿的，它是用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的一部分史实来做背景。那时不论任何人都不敢用这样的史实背景来写小说，而把它照事实没有忌惮地描写出来的。

原胡太明的一生，是这种被弄歪曲的历史的牺牲者。他追求精神上的寄托，远离故乡，游学日本，飘泊于大陆。但，毕竟都没有找到他安息的乐园，因此，他一生闷闷不乐，感到没有光明的忧郁，不时憧憬理想，但却反被理想踢了一脚，更又遭遇到战争残酷现实的打击，他脆弱的心灵破碎了。

“唉！胡太明终于发疯了！”

果是个有心人，又怎么能不发疯呢？”

写到这里，我本欲搁笔。忽然想起执笔当时的情境，觉得言有未尽之感，所以在此将当时的状况叙述一下。

1943年的战争，对日本是个存亡分野的战争。故不得不施行其极端的战争政策，因此自然而然分为时局投机者和厌战者两类，前者颂扬战争，推波助浪，后者被嘲为非国民。同时台湾人也是同样分为皇民和非皇民的。

在此矛盾中，难免发生不平、不满、猜疑、嫉妒等情形，于是谣言百出。到了马尼拉被美军占领以后，大家推测美军再由甚么地方登陆呢？香港、台湾、琉球等，总有一个地方被瞄准的。万一在台湾登陆呢？日本的军部不知用何方法来动员台湾人的知识分子，那是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都受到谣言的恐怖，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完全没有主意了。

可是，笔者对那个恐怖，却被心里急着完成这篇小说的冲动所压倒。当时笔者所住的房子，前面是台北警察署的官舍，一连排着十数间，其中也有熟悉的“特高”两三人。在这环境下，要写这篇小说的第四篇、第五篇是大不方便的，因之有点儿畏缩感。可是，谚云“灯台下照不到亮光”，出其不意，反而安全，这样想着就没有迁居了。但也不能不防万一，于是写好就藏在厨房的炭笼下面，有了一些数目就疏开到乡下的故乡去。

而今回想起来，好象有点儿傻得可笑。可是在那时代，实在也不得不这样，如果被发现到的话，不问事属好坏，马上被认为叛逆或是反战者来论罪，命必休也。

虽然那时候，已微露了历史是必然有转向的动态，但无意义的牺牲仍然应该回避的。可是空等着时机又觉难耐，空袭愈来愈加剧烈，不晓得在何时何地会逢其不测，不能预料。忽然涌起一种冲动的感情，急急要完成这部小说。现在一想，幸亏在那个时候，一鼓作气地写起来，不然的话，现在要写也就不容易了，纵

使能写出来，也不能透出当日的实感，因之作品也许会变了质吧。至于这部小说的好坏暂且莫论，只是第四篇、第五篇实为作者冒着生命之险的作品。

1956年1月10日

# 谈 描 写 方 法

吴 浊 流

表现方法上问题虽多，我只对描写方法提出来检讨。描写方法中，自然描写与心理描写是最普遍的，这么就描写这么，那么就描写那么，无论自然现象或是心理现象都忠实地表现出来。可是现代人的想象力，一天一天在进步，不必要拖拖拉拉的，不胜其烦，读者在时间上也不经济。象电影比从前进步得很大，可以想象到的地方都省略的。但现在作家大多数还走不出自然描写和心理描写的范围内，可是将来的文艺作品不要重视自然描写和心理描写。最须要研究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的。

我国的文艺作品，起初也是由自然描写做起，但到了唐代，诗词竟发达到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因为诗词上自然描写，含蓄不多，不浑成，嫌其浅薄就被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淘汰了。我举一二个例子来讲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的优点。孟浩然表现数千里的旷野实景，仅仅用五个字描写出来，若是现代作家不知要用多少字呢。他拿一丛树来做测量机，一望无穷无尽的旷野，终于天地相连，此间无小山也无小冈，都没有遮目的东西，不象天空，也不象海上，所以不能形容如天如海，只是缥缈无际的平原，一

望无垠，可以达到地平线，他拿“野旷天低树”五个字表现很出色，难怪乎，大诗人李白尊敬他“吾爱孟夫子”比对杜甫更敬意，其理由或因由两人的描写方法来的吧。我亦是感觉杜甫的自然描写比不上孟浩然的印象描写和他的抽象描写的。请看孟浩然的五绝诗及五言律比杜甫五绝五律在艺术上还有优点。我再举一个例，李白的抽象描写，他的力量，冠绝古今的。仅仅七个字，能表现一个美人使你惊骇，使你拜倒。我们看到天上的云彩，美到极点，百色齐备，任看不厌，看到发呆，其心情不能用口舌笔墨表现，任何东西都拿来比不得，突然他想出杨贵妃的衣裳就是这样的。又我们看到花美丽，看到口呆目迷，无物可比，突然高叫一声，这花什么东西都不可比，就是杨贵妃的面貌一样的。他仅用“云想衣裳花想容”七个字表现出来。

这七个字，我们可以想象杨贵妃的美貌。但究竟是鸡蛋脸、鹅蛋脸、瓜子脸等，谁都不知道。可是依此七个字可以感觉到不折不扣很美丽的绝世美人。她穿的衣服，也是一样，谁都不晓得如何格式，但只感觉非常美丽，是世上绝品的。

我想，现代的抽象画家，能象李白描写，换用丹青画出一幅，至少值得数十万元吧。

文学上，唐诗人的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这种描写方法不但诗词上可用，还可以应用其他文艺作品上，其技巧绝不输欧美作家的描写法。

我今拿我做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提出几个实例来说明一下：

该小说中文版第一一七页——

他（胡太明）联想到结婚的问题，于是自言自语：如果结婚就会生小孩子来，就是增加和自己同样的人，会被人叫“狸呀”而蔑视。这“狸呀”一代就够了，何必再来呢？